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6.02.010

削“汉”为“蜀”

——入晋蜀人的际遇与“蜀汉”历史的书写

陈毅超

摘要：《三国志·蜀书》以刘焉、刘璋两位益州刺史传记为首而不以蜀汉开国君主刘备传记为首的笔法颇不合史书通例，陈寿之所以采用这一笔法是为了淡化入晋蜀人前朝遗民身份以强化其地方士人身份。这种书写既是对曹魏“代汉”之正统叙事的一种配合，也是基于当时晋朝治蜀政策与蜀人政治生态而做出的一种主动选择，折射出入晋蜀人艰难融入统一王朝政权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三国志》；《蜀书》；入晋蜀人；蜀汉

中图分类号：K23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6)02-0098-09

收稿日期：2025-06-13

作者简介：陈毅超（1997—），男，福建莆田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E-mail: 12426553@qq.com。

一、引言

在文学史与文化史的研究中，以时代变化下个体的内心书写勾勒不同主流叙事之间的相互矛盾成为一种常见的学术范式，学界将坚守前一时代之主流叙事以拒绝后一时代话语者称为“遗民”群体，而将试图以新时代话语排斥旧时代叙事者称为“革命者”。然而在“遗民”与“革命者”之间，仍存在着一种较为中立的群体，他们的态度更为缓和，试图掩盖乃至缝合两种矛盾叙事以合理化个体在不同时代的行为举措，这一群体常以统一战争之屈服者的面貌出现，而这一中间群体常被历史研究所忽略。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或许在历史叙事的更迭中更具代表性，而三国至西晋时期，正存在着这样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就是被魏征服而进入魏晋政权的蜀汉士人。

二、问题的起源与研究史的回顾

首先需要回答的是，这一群体为什么值得被研究，应将他们置于什么样的框架内进行研究。对“入晋蜀人”这一群体展开研究的有王永平^[1]、薛瑞泽^[2]与杨帆^[3]，他们大都认为“入晋蜀人”曾遭到歧视和压

迫,钟思远^[4]则细致地分析了巴蜀士情因魏晋治蜀政策之转变而渐趋衰落的过程,这些文章的侧重点都在展现“入晋蜀人”被排挤的状态,而刘伟航^[5]则注意到西晋伐吴计划与治蜀政策之间存在联动。换言之,蜀人融入统一王朝的历程在以往研究中较少受到关注。学界常据中央政权的歧视性政策,进而判断蜀人普遍抱有排斥情绪。然而,这类研究多忽略蜀汉士人在融入过程中的主动努力及其历史条件;而这种主动调适与自我定位,正可从蜀人自身的历史书写中观察到。

蜀汉后裔陈寿(233—297)所著之《三国志》分为《魏书》《蜀书》与《吴书》三个部分。在这三部分中,《魏书》以《武帝纪》起首,记录了魏国的建立者及魏朝开国君主曹丕之父曹操(155—220)的事迹;同理,《吴书》的第一卷是《孙破虏讨逆传》,以吴国建立者孙权之父“破虏”将军孙坚(156—192)及兄长“讨逆”将军孙策(175—200)为起首;然而,《蜀书》却并不以蜀汉的开创者刘备(161—223)之传记为首,而以与刘备无亲缘关系之刘焉(?—194)与刘璋(?—221)两位益州刺史的传记《刘二牧传》为第一卷的内容,这一体例无疑是非同寻常的。

这一体例自然引起了古人的注意,刘知几(661—721)在《史通·编次篇》中指出,陈寿《蜀书》把“二主”传记置于“二牧”传后,由此有别于《史记》列陈胜、项羽传于高祖刘邦之后,隗嚣、公孙述于光武帝刘秀之后的体例,他认为,这说明陈寿把蜀贬斥为“伪朝”,刘知几因此对这种笔法提出了批评。清人何焯(1661—1722)却提出了与刘知几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陈寿在《刘二牧传》的“评曰”既然谈到了“庆钟二主”,把刘备比作刘邦与刘秀,便说明不是“夷昭烈于割据也”,他虽以“霸国之书”的体例排列《蜀书》,却是以“天子之事”的义例来说明刘备的行为具有“王者之兴,先有驱除”的合法性。但何焯自己也注意到了这种说法的破绽,他发现《吴书》中的刘繇等人的传记却排在孙策之后,于是又解释说陈寿的这种做法是“变其例,逊其词,所以待后之人自遇其旨于参错迷谬之中,故非当时所测也”。他的这一解释得到了李清植(1690—1745)的赞同,他又对何焯的说法作了补充,称《蜀书》之所以把“刘二牧传”列在首位,是为了说明“以董扶所谓‘益州有天子气’者为季兴受命之符”。他们的说法,无疑是自相矛盾的。刘咸炘(1896—1932)就质疑他们的解释,指出何焯与李清植所谓“驱除”的说法与历代史书的体例皆无法对应,不仅和两汉的史书不合,就连《三国志》的《魏书》《吴书》也未采用类似的体例。他随即指出,陈寿之所以列“刘二牧传”于“二主传”之前,实际上是“于蜀示偏方,而于吴则同正朝”,陈寿之所以采用这种笔法,是因蜀汉的疆域基本与刘焉、刘璋所辖地区相同^{[6]2300—2301}。

应当说,刘咸炘的解释最具说服力,但他的解释却涉及另一个问题,陈寿在《三国志》中对吴国表现出的态度往往是“绝对否定和排斥”,对魏国则是“无条件地服从”,但对蜀国则是“既肯定又反省”^[7]。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各君主传记末尾的“评曰”看出,还可以从史书笔法中看出,如陈寿在《武帝纪》中,称:“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6]2}在论及蜀国两位皇帝时,又称“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6]2326};并称“后主讳禅,字公嗣,先主子也”^{[6]2393}。而他对于孙吴的君主,则表现出明显态度上的不同,“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也”^{[6]2823};“策字伯符”^{[6]2847};“孙权字仲谋”^{[6]2883}。这都可以看出陈寿尊魏、霸蜀、贬吴的倾向。如此,便十分难以理解为何陈寿会在《三国志》中赋予蜀汉比孙吴更低的政权地位。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何焯、李清植所发现的那样,陈寿本人也并不认同刘焉、刘璋政权,他在《刘二牧传》的“评曰”中指出:“昔魏豹闻许负之言则纳薄姬于室,刘歆见图讖之文则名字改易,终于不免其

身，而庆锤二主。此则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而刘焉闻董扶之辞则心存益土，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据土乱世，负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见夺取，非不幸也。”^{[6]2821}陈寿指出，魏豹因为许负所谓薄姬将生下天子的相说便将她纳为后室，刘歆因为“刘秀当为天子”的讖言便改变名字，但仍不免于被杀的命运，而刘邦、刘秀两位皇帝应验了预言，这就说明神明和天命都不可妄加揣度，而有其必然的结果。同理，刘焉听董扶说“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就想霸占益州，听说吴氏将大贵就让儿子迎娶她，而因此觊觎帝位，这是十分不明事理的。陈寿又提到，刘璋才能平庸，称不上英雄，而在乱世之中占据了土地，由此引来了他人的侵犯，这是自然之理，他的领土被夺走，不是因为运气使然。然而，正是陈寿对刘焉、刘璋这种不认同的态度，使得他把“二牧传”放在“二主传”之前的做法显得自相矛盾。陈寿的这种做法，需从其书写的具体环境加以解释。

三、蜀汉分立到黜汉为蜀：“据蜀”话语的建构

蜀汉政权历史书写的转变，鲜明地体现在其国号变迁之上。“蜀汉”原本是一个地理概念，指巴蜀、汉中，这一词汇直到宋代才开始被正式视为一个政治概念。而就三国时期而言，不管是曹魏、蜀汉还是吴人，都不会并称“蜀汉”来代指刘备所建立的政权，而只会称它为“蜀”或“汉”^[8]。称蜀汉政权为“蜀”或“汉”，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历史话语^[9]。延康元年（220年），汉献帝下诏禅位于魏王曹丕，在曹丕的告天文书中，提出“今天既讫我汉命”，又提出“比昭有汉数终之极，魏家受命之符”^{[6]261}等话语，可见在曹魏所建立的禅让叙事中，汉的历史实际终结于黄初元年（220年）。

蜀汉人建构了一套完全不同的历史叙事，在汉献帝禅让的同时，刘备先是以“汉帝见害”的传闻“发丧制服”，为汉献帝上谥号，同时继位登基，在他的告天文书中，他谈到“备畏天命命，又惧汉阼将湮于地……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6]2378}可见，在刘备势力所构建的历史话语中，建安二十五年所终结的只是汉献帝个人统治的历史，汉的历史在蜀地依然得到了延续。由这种“代汉”与“承汉”的历史话语延伸出两种对刘氏政权完全不同的称呼方式，曹魏人坚持把刘氏政权称为“蜀”，如《三国志·贾诩传》记载“文帝即位，以诩为太尉……帝问诩曰：‘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对曰：‘……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6]1060}而刘氏政权则坚持以“汉”自称，如刘备册封刘理的诏文称：“小子理，朕统承汉序，祇顺天命，遵修典秩，建尔于东，为汉藩辅。”^{[6]2435}

相比之魏、蜀两国相对连贯的话语，吴人对刘氏政权的称呼则比较混乱，有时称之为“蜀”，有时则称呼为“汉”。如孙权在与蜀汉人订立盟约时，将其称之为汉：“今日灭叟，禽其徒党，非汉与吴，将复谁任？……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6]2937—2938}。然而在非蜀汉人参与的场合，吴人则常把刘氏政权称为“蜀”，如吴大鸿胪张俨所作《默记》，就把诸葛亮称为“蜀相”，认为：“今蜀、魏为敌战之国，势不俱王……”^{[6]2498}孙吴称刘氏政权为“汉”的用意十分明显，即希望借助刘氏政权承“汉”的话语以为自己反魏树立合法性，而将其称之为“蜀”也不过是为了将“蜀”与“魏”都拉到与自己平行的政治等级，从而把代汉者“魏”与承汉者“蜀”都塑造为与“吴”类似的地方割据势力。

“蜀”“汉”分立与“蜀”“汉”并存的局面终结于魏景元四年（263年）。这一年，魏国任命邓艾、诸

葛绪、钟会等人率军征蜀，至十一月，刘禅向邓艾投降，刘氏政权至此灭亡。在献给邓艾的降书中，刘氏政权承认道：“限分江汉，遇值深远，阶缘蜀土，斗绝一隅，干运犯冒，渐苒历载，遂与京畿攸隔万里。”^{[6]2419—2420}

刘氏政权对以“蜀”自称话语的接受，意味着其承认承汉话语的非法性，从此“蜀国”不得再以“汉”自居。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魏人即使在灭蜀后依然对蜀汉政权“承汉”的话语感到警惕——在魏灭蜀的第二个月，魏国的统治者将蜀汉原有的领土分为梁州与益州两个州，由此消解了“汉”在地理空间上的存在。魏人还在次年（264年）三月封刘禅为安乐公的诏书中特别强调：“于时乃考因群杰虎争，九服不静，乘间阻远，保据庸蜀……故爰整六师，耀威梁益。”^{[6]2423}这一封策命的措辞十分审慎，它非常有意地避开任何有关“汉”的字眼，这重点体现在对“汉中”一词的规避上——直到蜀汉灭国前夕，汉中依然在蜀汉的领土范围内，而为了避开“蜀、汉”的称谓，这封策命将黄初元年（220年）便已归附魏国的“庸”（上庸）划入了“蜀”的领域，这当然与汉中一地对于汉政权具有特别的政治意味有关。这种空间称谓上的错位，显然是为了彻底解构刘氏政权与“汉”之间的关系。

如此，《蜀书》以“刘二牧传”起首的安排自可解释。曹魏以及后来西晋王朝统治者对蜀人承汉话语的警惕，决定了《三国志》关于蜀汉政权的记载只能以“蜀”命名而不能再以“汉”称呼。正是基于这一正统话语框架，《三国志》关于蜀汉政权建立的追溯便不能以“承汉”事迹为始，而不得以“保据庸蜀”之蜀地分裂的历史谈起。从这个角度而言，刘焉、刘璋父子是最早促成蜀地与中央断绝联系的地方割据势力，因此关于蜀地的历史叙述亦不得不从他们开始讲起。尽管陈寿认为刘备“驱除”刘璋的行为具有合法性，但却终究不得不服从于三国一统这个更大的政治话语。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陈寿以“刘二牧传”为首的书写只是一种被迫的选择呢？这却未必使然，因为陈寿并未将相同的书写逻辑运用于吴政权的书写上，甚至于他以孙坚起首的书写选择实则淡化了吴国作为地方的身份，而认同了其作为独立王国的存在。而如上文所云，在陈寿的评价体系之中，蜀汉政权的合法性要高于孙吴政权，那么他在《蜀书》中以“刘二牧传”起首而在《吴书》中不以“刘繇传”起首的原因就只有一个，即他主观上也接受了削“汉”为“蜀”的主张。那么，陈寿为何会在主观上接受这一书写策略呢？要说明这一问题，必须从蜀汉遗民的社会处境与西晋治蜀政策的阶段性调整入手。

四、变蜀为益：治蜀政策的转向与蜀人的心态变化

蜀国刚被灭亡时，蜀地遗民的处境十分艰难，其士人也因受到歧视而不得出仕为宦，这一方面使蜀人起初对魏晋政权仍存抵触，另一方面也促使蜀人试图抓住一切际遇改变自身在新王朝的处境，而这两方面的行为却在蜀人身份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巧妙地相互推动。在蜀国灭亡后，后主刘禅一家就被要求迁居洛阳^{[6]2423}，随他一起迁徙的还有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三万家蜀汉公卿的家属，他们或徙居于关中地区，或被迁往更遥远的河东地区^{[10]324}。据说，他们被免去二十年的田租。但据《华阳国志》的记载，他们的生活依旧大不如前：“（泰始）五年，散骑常侍文立表复假故蜀大臣名勋后五百家不预厮剧，皆依故号为降”^{[10]326}。

据此段记载可知，在泰始五年（269年）以前，一些蜀汉公卿的后代沦为庶人，甚至要参与徭役。除此之外，那些有幸出仕者，也难免因外界环境的打压而自轻自贱，如西晋名士皇甫谧^{[11]415—446}对文立就曾

有“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之论；而李密^{[6]2797}《陈情表》亦云“臣少仕伪朝”“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可以想见，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他们难以心甘情愿地配合新王朝的政治话语。然而，形势不久即发生了转变。

就在魏国灭亡蜀国的不久后，吴国趁势派兵入侵永安，这一边境危机不仅引起了魏人的警觉，也激起了蜀人的不满，因此他们虽已亡国，却仍奋力抵抗。而吴人虽因蜀将罗宪的抵抗未在蜀地取得战果^{[11]1551-1552}，却仍未放弃在西线与魏晋势力的战斗。咸熙元年（264年）六月，东吴交阯郡吏吕兴举交阯郡投降曹魏，曹魏政权因而试图进一步扩大自己在交广地区的影响力，然而八月时，吕兴便被手下所杀。十月，西晋在蜀地开始劝募蜀人内移，并开出“给廩二年，复除二十岁”的条件^{[6]564-569}。这一系列情况都表明，尽管当时魏国已经平定蜀地，但外部压力仍对魏政权在蜀地的统治构成了显著威胁，而地方精英、旧官僚及其部曲成为魏、吴政权掌控领土的重要依傍。面对这一情况，新登基的晋武帝采用了怀柔蜀地士人的策略。他先将此前在抵御吴军入侵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蜀地旧将罗宪召至洛阳，询问其“蜀大士子弟”及“先辈宜时叙用者”的情况，并于泰始二年（266年）启用梁、益的士人，其中蜀郡柳隐、巴郡文立被分别任命为西河太守与济阴太守^{[10]325}。此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蜀地士族的处境，然对蜀地百姓之抚绥尚有限。

泰始四年（268年），军士王富假借诸葛瞻的名号发动叛乱，召集了数百人之众。尽管这一叛乱很快便被平定，却提示了西晋统治者蜀地旧族在蜀地的动员能力^{[10]323}。于是在次年，晋武帝接受了蜀人文立提出的“故蜀大臣名勋后五百家不预厮剧，皆依故官号为降”的提议，并将文立擢拔为散骑常侍。在晋武帝的诏书中，他把这一政策比拟为“昔光武平陇蜀，皆收其贤才以叙之”，表明了其将蜀人纳入统一王朝的决心^{[11]2347}。陈寿为此编撰了《益部耆旧传》十篇，经文立呈奏而献至晋武帝^{[10]480}。这些史实表明，蜀地的叛乱与西晋王朝治蜀政策的转变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至泰始七年（271年），蜀地再次出现了叛乱事件，首先是汶山守兵吕臣发动叛乱，尽管吕臣很快被诛杀，但蜀地的局面却并未得到稳定。泰始八年（272年），益州刺史皇甫晏准备讨伐汶山白马胡，反被手下“中州兵”所杀，其兵士一时大乱、抄掠百姓。最终广汉太守王濬率兵救援，平定了这一叛乱，并因此被任命为益州刺史。与此前不同的是，巴蜀当地士族在此次叛乱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广汉人李毅快速判明局势，要求太守王濬迅速发兵平叛，而蜀郡人何攀则及时前往洛阳禀明情形。这一事件无疑再次警示了西晋统治者蜀地局势的复杂性及蜀人在地方管辖上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此推动了西晋王朝治蜀政策的又一次转变。泰始十年（274年）《诸葛亮集》的编撰，正是这一政策转变过程中一件相当具有标志性的事件^[12]。

诸葛亮（181—234）是蜀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曾先后领导数次北伐行动。就蜀汉人而言，诸葛亮当然是相当重要的精神象征，而对于魏晋人而言，诸葛亮却是一个屡屡发动战争侵扰边境的敌对人物。然而即便如此，诸葛亮这个人物仍为晋武帝所重，并由他亲自下令为诸葛亮的作品编次成集。考虑到诸葛亮在北伐战争中与晋高祖司马懿（179—251）的数次争锋，乃至有羞辱之举，此一政令殊为不寻常。《诸葛亮集》的编撰者陈寿就在集序中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惊喜与感激：“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之有伦也。”“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6]2487-2488}陈寿说，诸葛亮辅佐敌国，仗着山川险要拒绝服从，但陛下仍然下令保存他的言说，害怕他的善行被人遗漏，这完全是出于晋

朝光明之上的道德。他还称赞晋武帝的行为已然超越了古代的圣贤,已然涤荡了任何猜忌之心,如此才能容忍敌国诽谤的话,无所顾忌地完全保留他的言辞。

晋武帝的行为确表现出了一代君王的胸怀,可更应当看到的是,他编撰《诸葛亮集》的行为绝不仅仅是为了推崇一位鞠躬尽瘁的敌国领袖,还带有借其才干反证自身统治合法性的用意,就如陈寿在《诸葛亮集序》所总结的那样,诸葛亮北伐行动的失败,是“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6]2488}。除了说明晋朝乃是“天命有归”之外,拉拢、怀柔蜀汉遗民也是晋朝统治者推崇诸葛亮的的一个重要因素,陈寿《诸葛亮集序》便说道:“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6]2488}陈寿说,诸葛亮去世的时候,百姓口中仍时常有怀念他的话语,直到如今,梁州、益州的百姓叙述诸葛亮的言行就仿佛亲身见闻一样。就算是周人怀念召公、郑人歌颂子产,也无法比拟。此处陈寿的措辞非常谨慎,他与魏晋的历史书写一致,都非常小心地避开有关“汉”的字眼,并将诸葛亮的怀思者比作“周南”与“郑人”,这便巧妙地隐去了怀思诸葛亮者前朝遗民的身份,而代之以地方齐民的内涵。陈寿这里的书写非常充分地体现了在晋朝对蜀政策转变之下,蜀地士人融入新政权时那种小心翼翼的态度。

可见,从晋武帝登基为帝到泰始十年这短暂的十年时间内,由于吴国的威胁与蜀地的叛乱,晋朝统治者对入晋蜀人的政策愈发倾向怀柔而非歧视,而又由于这一政策的转变,长期遭受歧视的蜀人努力地把握这一难得的机遇相互推举,配合王朝的各项政策,以求完成自我身份从“亡国者”到“地方齐民”的转变。正是基于此背景,陈寿出于融入新政权的考虑,有意地在《蜀书》中采用了强调蜀人地方身份并削弱前朝遗民身份的书写策略。

如果说上述史实在论证蜀人之心态转变方面仍显薄弱的话,那么蜀人在西晋伐吴战争中的表现则充分证明了他们积极融入新政权的态度。

五、从被征服者到征服者:蜀人伐吴与蜀人身份的转变

在西晋灭吴战争过程中,蜀人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西晋正式发动伐吴战争。西晋军沿长江分为六路进军,其中益州刺史王濬从巴蜀地区顺江东下。在此次战争中,与西晋大多数重臣犹疑不决的态度相比,王濬军表现得尤为果决,以至兵至秣陵时,不等与王浑会合和商议便率军直入建康城,纳降灭吴,甚至因此酿成政争。而在此次伐吴战争中,蜀地士人在王濬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濬自上游出发,得以迅速地抵达下游的建业,与其此前在巴蜀地区大造战舰的准备有关,《晋书》称其“舟楫之盛,自古未有”^{[11]208},而在王濬的造船工作中,蜀人何攀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据《华阳国志》记载,此前造船者唯有“佃兵”五六百人,何攀要求借调诸郡武吏,最终集结了万人共同制作,一年就完成了造船任务,他又商议向蜀民直接购买树木缩短运输周期,使得王濬一部极早便完成了作战准备^{[10]490-491}。王濬军中颇多蜀人,据说王濬此前任巴郡太守时,采用各种举措制止了当地杀男婴的行为,而至此他伐吴时,“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军”^{[11]208-209},王濬后来被王浑弹劾,也曾上疏自辩说“臣军类皆蜀人”^{[11]214}。材料虽不足以证明,王濬军在伐吴行动的积极姿态是否与蜀人有意借用此次军事事件以改善蜀人之政治生态、实现自我身份由被征服者向征服者之转换有关,但总证据足以表明,蜀人参与伐吴的意愿十分强烈,以至于这种意愿改变了西晋王朝统治者对蜀人的印象。在灭吴

之后,晋武帝在策对时直接考校吴地士人华谭说:“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赵眚,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11]450}晋武帝策对华谭之事大抵发生于太康三年至五年间(282—284),而据《晋书·张载传》记载,“太康初”时,张载还因“蜀人恃险好乱”而“著铭以作诫”^{[11]516}。由“恃险好乱”向“无携贰之心”的转变,充分说明了朝廷对蜀人之态度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又尤以晋朝统治者允许蜀人陈寿编撰代表统一话语的《三国志》最具代表性,据说当时出自曹魏素族的夏侯湛亦在编撰《魏书》,可看到了陈寿的《三国志》后便自毁己书,张华看了他的《三国志》后亦大加赞叹,甚至提出将过事“《晋书》相付”^{[11]2137}的说法。这些事件都表明,在中原人士看来,陈寿已不再是一位亡国遗民,而成了一位为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化内”之士。陈寿的这一身份转换,反映了蜀人因西晋完成统一而由“被征服者”转变为“征服者”的历史。

晋朝统治者对蜀人的态度有所转变,蜀人自身的身份认知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一点同样可以从陈寿的《三国志》中看出。从陈寿的视角来看,蜀人因伐吴而得以被认同的机遇自然是十分难得的,他势必要在史书中进一步推动蜀人的身份转化,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在《三国志》中想方设法地淡化蜀人作为“遗民”的身份,而多方强调自身作为地方的身份,这就是为何他不可能把代表“承汉”话语的“二主”视为蜀国历史的开端,反而将并不具有合法性的“二牧”置之于前——陈寿所想要塑造的,是被地方军阀统辖而割据一方的“蜀人”的历史,而不是代表前朝统治向新政权宣战的“汉人”的历史,他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蜀地会与中央发生分裂,而不是刘氏王朝存亡的始末。而《蜀书》的体例之所以与《吴书》不合,也是很容易理解的,这种体例上的差异正是为了塑造已然被纳入统一王朝、作为征服者的蜀人与刚被军事征服的吴人之间的区别。

六、余论

综上,本文从蜀汉遗民的际遇出发,解释了《三国志·蜀书》为何以“刘二牧”起首而不以“先主传”起首的问题。确实如前辈学者所言,蜀汉遗民入魏、入晋之后,遭受了压迫与排挤,但由于吴国的威胁与蜀地的叛乱,晋朝治蜀策略发生了转变,蜀地士人由被排挤、歧视转向被怀柔与拉拢的对象,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诸葛亮集》的编撰成为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事件。蜀人有感于自我身份转化机遇之难得,因此积极参与蜀地叛乱之平定与伐吴战争,并最终彻底博得了新王朝统治者的认同,乃至获得了“蜀人服化”的评价与编撰史书的机会。陈寿在三国志中之所以以“刘二牧传”作为《蜀书》的第一卷,是为了将其由一部记载敌国政权的史书转变为一部记载蜀地与中央发生分裂之缘由的史书,以此淡化蜀汉政权作为“前朝”的性质,强化蜀人作为“地方”的色彩,体现对统一王朝的认同与实现蜀人身份的转换。陈寿的这一笔法,并不仅仅是一位史官基于“正”“伪”认知而采用的体例,更是一位亡国遗民基于现实政治环境的一种选择。

当然,上述的观点只是勾勒各种史料对陈寿史书书写的一种解释,在这一解释之外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首先,《蜀书》以“刘二牧传”起首的做法是否是因为蜀汉政权内部本身便存在着“蜀人”与“汉人”两种不同的自我认知?如田余庆先生《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所论,蜀汉政权内部存在刘璋旧部与刘备旧部两个集团^[13],而前者中“益州在官地主”的势力亦十分强大^[14]。也就是说,蜀汉政权内部本身便存在着以“蜀人”为自我身份认知的群体,而陈寿,包括入晋之后积极配合晋朝统治的罗宪、

文立及他们的老师谯周都属于“益州在官地主”一系。那么,这批“蜀人”是否在刘氏政权的统治下便完全接受季汉所谓“汉人”的身份了呢?入晋之后,他们对“蜀人”身份的接受,究竟意味着一种自降身份的妥协还是一种原本被“承汉”话语所压抑的自我身份认知的回归呢?其次是,蜀人为实现身份转化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是否足以使他们被视为“晋人”?据《晋书·何攀传》所载:“时廷尉卿诸葛冲以攀蜀士,轻之,及共断疑狱,冲始叹服。”^[11]^[290]尽管何攀后来因才干得到了尊重,可仍能说明蜀人在配合晋朝征服吴国后,其在王朝中依然受到中州士人的排挤,其“蜀士”仍遭到歧视,这种排挤究竟只是一种地域歧视,还是仍为一种征服者的歧视却难以言明。

但无论蜀人这种削“汉”为“蜀”的做法究竟是基于何种目的,以及其努力是否得到新王朝的承认,都揭示了陈寿及其《三国志》编撰背后复杂而又曲折的历史。而这种历史的层累与交织并未随着蜀国的灭亡而盖棺论定,在蜀汉灭亡百年之后,蜀汉政权被黜落的“汉”记忆得到了复活。据《晋书·习凿齿传》记载:“是时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11]^[254]

据《晋书》的记载所言,习凿齿当时有感于桓温觊觎帝位的威胁,于是写作了《汉晋春秋》塑造了新的正统观,他将汉晋之间的魏黜为“篡逆”以示警诫,而将蜀立为三国的正统,以此说明晋朝得国之正。习凿齿抱有此种史观的目的,当然不是简单地为亡故的蜀汉政权翻案,而是为南迁的东晋政权确立合法性。东晋面临的问题,与蜀汉政权有很大的相似性,即他们都是在异都继承前朝法统的王朝。而后世面临相同困境的王朝,亦多以蜀汉为三国之正统,以此反证自身之合法性。如朱熹的《通鉴纲目》就一反司马光《资治通鉴》以魏为正朔的写法,而以蜀汉纪年接续东汉纪年^[15]。随着朱熹在元明被确立为圣贤,他的史观自然也影响了后代的历史书写,如《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一广为流传的通俗小说便明确采用了“褒刘贬曹”的态度,以至于奠定了今人关于三国的正统认知^[16]。

参考文献:

- [1] 王永平.入晋之蜀汉人士命运的浮沉[J].史学月刊,2003(2):24-29.
- [2] 薛瑞泽.魏晋南北朝北迁蜀人后裔的活动[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36-41.
- [3] 杨帆.蜀汉入晋文士群体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5.
- [4] 钟思远.论蜀汉归晋后的士情与文情[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1(2):137-142.
- [5] 刘伟航.试论西晋政权在平吴前的对蜀政策[J].南充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4):82-85+93.
- [6] 陈寿.三国志集解[M].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 [7] 戴燕.《三国志》讲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引言23.
- [8] 杨小平.三国蜀汉政权国号“汉”考论[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63-66.
- [9] 付开镜.略论魏蜀吴建立前对其政权合法性的宣传[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4):143-145.
- [10] 常璩.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M].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
- [11]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2] 李纯蛟.西晋朝编纂《诸葛氏集》动因刍议[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1-4.
- [13]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4] 贾海鹏.三国时期吴蜀两国人才籍贯的地理分布状况及其政治影响[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81-92.

- [15] 朱熹. 资治通鉴纲目:第3册[M]. 赵师渊,编撰. 北京:中国书店,2021.
- [16] 李纯蛟. 论蜀汉在三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一)——以史学为中心的考察[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5):56-61.

Demoting "Han" to "Shu": The Fortunes of Shu People Entering the Jin Dynasty and the Writing of "Shu-Han" History

CHEN Yichao

Abstract: In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Book of Shu (Sanguo Zhi: Shu Shu)*, the writing style of taking the biographies of Liu Yan and Liu Zhang, the two governors of Yizhou, as the beginning instead of the biography of Liu Bei, the founding monarch of Shu-Han, is quite inconsistent with the general rules of historical books. The reason why Chen Shou adopted this writing style was to downplay the identity of the Shu people entering the Jin Dynasty as former dynasty survivors and to strengthen their identity as local scholars. This kind of writing was not only a cooperation with the legitimate narrative of the Cao-Wei regime's "replacing the Han Dynasty" (Dai Han), but also an active choice based on the Jin Dynasty's policy of governing Shu and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Shu people at that time, which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Shu people entering the Jin Dynasty struggling to integrate into the regime of the unified dynasty.

Keywords: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Sanguo Zhi)*; *Book of Shu (Shu Shu)*; Shu People Entering the Jin Dynasty; Shu-Han

责任编辑:郭珊珊